

战后中苏关系走向

(1945—1960)

——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

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战后中苏关系走向

(1945—1960)

——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

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Zt26/20

战后中苏关系走向

(1945-1960)

——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

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125 印张 232 千字

印数 0001-1200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868-4/K·120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薛 衡 天

1995年8月，由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召开。会议主题是“二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1945—1960）”，与会学者还就中俄关系史中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会议前后共收到学术论文和报告提纲计23篇，本文集即是这些学术论文的选编。

战后中苏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艰巨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战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不仅直接影响了中苏两国本身的内外政策，而且直接关系到国际共运的前途与命运，以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组合。而要探究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除要研究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之外，还必须研究中苏两党关系，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异同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还应进一步研究由中俄两大民族的文化渊源、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决定的两国不同的发展取向等深层次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等等。其中一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曾是研究禁区，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性。此外，在资料准备上还有很大困难，在理论原则上还有许多有待突破的难点。凡此种种，全面开展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次同江会议仅就这一课题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探讨，收入本文集的文章不足以反映该阶段中苏关系的全貌也就在所难免了。

本文集的前三篇文章，起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于1960年末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关系恶化，第四篇文章则综合分

析了新中苏联盟走向分裂的原因。这一组文章是同江会议的主题，文章从各自的角度论述了相应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事件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是中苏旧的同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破裂到新的中苏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确立两国关系的转轨时期。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一文，以战后东北问题为核心，论述了中（国共两党）、苏、美三国四方关系的变化组合过程。该文认为，战后东北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是中共、国民党、苏联和美国争夺的战略基地。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构筑了战后中苏美三国关系的框架，东北问题则是这一框架的支柱。美国以同意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侵略特权，换取了苏联出兵东北；国民党以苏联保证将东北主权交给自己为条件，与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东北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了中苏关系的基础。战后，中共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抢先进入东北，打破了美苏构筑的对华关系的框架，而美苏两国也从战争中的同盟关系很快转化为对抗和争夺关系。于是中共、国民党、美、苏四方各自选择自己的盟友。蒋介石一头栽入美国的怀抱，率先实行外交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中共与苏联则在东北结成盟友，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公开宣布了外交对苏“一边倒”的方针。1950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东北问题仍处于核心地位。苏联同意将大连港交还中国，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不迟于1952年末实现移交），苏军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走。正是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中苏才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的同盟关系才得以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国随着国共政权的更替其外交也最后实现了转轨。该文是从中苏国家关系的角度论述战后中国外交“一边倒”形成过程的一篇内容比较翔实的论文。

1950年至1953年发生在中苏关系史上的最重大事件是在苏

联支持下的中朝抗美援朝战争。“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①，巩固远东和平，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宗旨。这个“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就是指美国。美军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中苏家门口，这对刚刚缔结的中苏盟约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出兵朝鲜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是中国在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做出这一决策“与中苏之间结成同盟关系有什么直接和内在的联系？……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有什么不同？……中国卷入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沈志华在《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一文中作出了颇有见地的回答。作者通过对中俄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1000余页俄国政府解密的包括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之间往来函电在内的原始档案文件的分析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在进入冷战状态之后，苏联“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要求，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中国在贫困落后的情况下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自己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朝鲜战争是西方研究的热点。有关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由于观点和材料的片面性所得

① 《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第92页。

出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和武断，沈文将中俄双方文件对照研究之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就有了说服力。

李丹慧的《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一文，将1954—1960年的中苏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54—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前的最佳状态，苏共二十大至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双方趋同与背离阶段和1958年初至1960年末中苏关系逐渐冷淡直至走向公开分裂的阶段。文章的新颖之处是，它清楚地理出了贯穿在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中的两党关系、两国关系、两党领袖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脉络。在以上几种关系中，作者认为两国领袖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特别是他们各自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是确定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两国领袖当中，又以毛泽东为主。全文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及对苏联认识的不断变化，一步步地展现出中苏关系相应地随之变化的历史过程。文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又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内，这就避免了西方学者将个人置于历史之上（甚至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为历史人物的性格和某种特殊疾病）而走向唯心论的流弊。

由于中苏外交基本上是首脑外交，首脑的决策基于他们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对方的认识。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失败，既然是个人的认识就必然有局限性。这样，在两国首脑之间出现外交决策失误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朱瑞真《中苏分裂根源》一文分析了导致中苏关系从联盟走向分裂的六个因素，并认为“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到底是哪些因素制约着中苏关系的分合，又以哪种因素为主，这是仍然需要深入进行研究的问题。但中苏关系从分裂走向对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是不争的事实。作者指出：“这两个友好盟国开始从友好合作走向分裂和对抗，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从延续了20多年的分裂和对抗的后果看，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中苏都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这种无谓的消耗，大大地损伤了两国经济发展的元气；双

方的相互攻击，丑化了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总之，两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苏两国从这种分裂和对抗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不言自明了。

第6、7、8、9四篇文章为第2组。这四篇文章就抗战期间和抗战前后东北和西北问题在中苏关系上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论述。每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对整个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战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即是前一组文章的重要补充，也是“战后中苏关系走向”这一主题的组成部分。这四篇文章各自独辟蹊径，以扎实的史料，论证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徐万民的《论西北国际交通线与战时及战后中苏关系》一文，史料十分丰富翔实，可以说与论题有关的中俄双方的基本史料尽行扒梳钩沉，将西北国际交通线这条连结中苏关系的大动脉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地位剖析得淋漓尽致。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俄（苏）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史中的显著特点。但国内外中俄（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十分薄弱。因此，第3组的两篇文章就显得弥足珍贵了。李随安以“时代出版社”的活动为中心论述了从日伪到解放初期中国引进、介绍和传播苏联文化的情况；邱桂荣的文章则从俄苏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论证了俄苏中国学的双重作用：既充当俄苏对华政策的附属物，又充当了增进中俄两国了解和促进友好关系发展的桥梁。中俄（苏）文化交流及其对两国关系的重大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论著问世。

最后一组的三篇文章系论述中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这两个毗邻地区的经济关系和两国人民在两地开发中的作用。这对两国毗邻地区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今天来说，显然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特别是张宗海的文章，从中俄加强经贸关系的角度，指出了今天俄国远东地区在对待华侨（华工和华商）问题上所存在的隐忧。作者的负责精神（不回避问题）应当受到学者们的敬重。

众所周知，今天有5千多万华人和华侨散居于世界各地，不管他们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但有一点则是举世公认的：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了繁荣！至于华侨在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开发中的历史作用，王晶的《华工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一文及该文所引用的大量权威性的俄文文献足以证明了华侨对远东经济的发展曾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黄定天的《论苏俄在哈尔滨的银行业》也肯定了俄国资本和俄侨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方面。哈尔滨由19世纪末的荒凉渔村，只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近代化的都市，没有俄国巨额资本的输入和俄国人民参加建设，这是不可想象的神话！只要不怀偏见地、冷静地翻检中俄关系有关历史文献，就会发现中俄两国人民都各自对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又是未来的起点，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现实的要求是，中俄边界必将成为更加紧密地连结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而不是隔绝这种往来的鸿沟。

文集最后附上酆永庆的《建国后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述略》一文，以便读者对本学科研究状况有一个梗概的了解。

※ ※ ※ ※ ※ ※

前文已经提到，全面进行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其实包括整个中苏关系史研究）还面临许多困难。我们概略地探讨一下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也许对克服这些困难是有点好处的。

首先，关于禁区问题。50年代外交对苏“一边倒”时期一些学者写了一批阐述中俄关系和中苏关系史方面的文章和小册子。当时为了配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宣传，这些出版物只能强调那些中俄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积极方面，反之，不管什么出版物，乃至言论都被看作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中苏关系史研究被打上了政治印记，这一研究领域的负面便成为研究的“禁区”。从60年代的头几年起到整个70年代，中苏两党和两国

关系日益恶化，两党展开了空前的大论战。就形式逻辑而言，这正是对中苏关系史正负两方面进行全面研究的有利时机，但当时的论战是以意识形态争论方式表现出来的。我国官方文件和权威性文章以列宁、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来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无形中全盘肯定了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全盘地否定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就成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的、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斯大林时期的中苏关系有正面，也有负面；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有负面，也有正面。但一个“全盘肯定”再加上一个“全盘否定”，就把中苏关系研究领域中大部分地盘统统划入“禁区”之中。于是便出现了这种局面：除党政部门因特殊需要组织一些专门研究之外，一般史学工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无一敢问津者。

对那场中苏两党大论战，邓小平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作为影响中苏两国关系发展的意识形态因素，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就“一风吹了”。由于那场争论所造成的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禁区”也相应地打破了。但是那场争论却强烈地告诉人们，在中苏关系史上意识形态因素是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是绕不开、回避不了的。于是，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又遇到了第二大困难：即如何看待贯穿于两国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历史过程表明，贯穿于这一历史过程中有两条鲜明线索，一条是两国之间的一般外交关系以及经贸、文化交流关系，这与一般的中外关系——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是一样的，另一条是通过两党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既统一，又矛盾（甚至有时是完全对立）的线索，这条线索则是中苏关系所特有的。这就使中苏关系研究较之一般中外关系增加了复杂性。问题还远不止于此。问题的难处主要在于这两条线索并不总是重合一致的，在它们之间常常表现为相互交插和矛盾对立的情况。例

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就在中苏缔结盟约时，斯大林却从中国要了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开始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也正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最佳状态，苏方消除了在中苏盟约中对华不平等因素，并大量增加了对华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时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严重的分歧，但两国关系却实现了正常化。然而赫鲁晓夫改善对华关系的举措并未能阻止毛泽东对他的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以致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看来是意识形态在制约着两国关系，很大一段时期中苏两国学者都持这种看法。其实，无论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还是两国关系，都受两国民族利益的制约，它们是两国民族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互相制约关系，只有相互影响关系。

1989年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作了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讲了“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在欺负中国的列强中“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关于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而后还有越南战争。”但是，“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

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他还特别声明，中苏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关系恶化，“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以上引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295页）用不着再多加解释，这些话证明制约中苏关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国家关系的破裂的根本因素是民族利益问题。在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不但没有清理这笔历史旧账，反而继续损害中国，以至在中国边境地区屯兵百万，使中国全民族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发动大论战也好，中国政府冻结对苏关系也好（尽管这样做是被动的、被迫的），都是从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出发，即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对苏联来说也是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等等，其中所包涵的核心内容则是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因此它同样受民族国家的一般规律的制约。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民族国家政权、捍卫和拓宽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俄国苏维埃政权也同样具有民族国家政权的一般属性，尽管其政权性质被称为无产阶级政权。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俄罗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俄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又包括各个阶级与各个阶层，掌权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内、外政策必须代表全民族的最大利益，否则它就无法维持对国家的统治。此外，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旧的社会制度中孕育诞生的，它不可能一刀割断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而且必须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优秀部分，它才能在本国土地上存在下去。列宁主义之所以在俄国取得胜利，是因为它是俄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所创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其根本，仍然受俄国（而后是苏联）的民族利益要求制约。

列宁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同发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在一起的，而发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是同保卫、巩固和发展俄国苏维埃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是：“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①那么，什么是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呢？列宁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大战之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所有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②换句话说，苏维埃俄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所有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时都要以捍苏维埃俄国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即“对苏一边倒”。这样，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上也是以俄国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因为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正是代表了俄国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也提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严格要求。他说，无产阶级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即俄国一引者）“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③但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都象俄国一样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世界革命并没有如列宁和共产国际领袖所预期的那样按时到来。这样就使苏俄和后来苏联领导人在相当长的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第27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3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67页。

史时期执行二律背反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发动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政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和资本家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甚至在必要时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并要求该国家的无产阶级服从于俄国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不是“双向的”了，而是“单向的”了；所谓“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俄罗斯民族—引者）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云云，就成了一句空话，其它国家无产阶级斗争利益服从于俄罗斯民族利益就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

上述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通过共产国际一大和二次确立下来的。在当时，面对协约国帝国主义对苏俄实行联合武装干涉、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被国际反动派绞杀的危险，列宁和共产国际提出将保卫苏俄作为各国无产阶级“最基本的利益要求”原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联合干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时期的永恒现象，事实上在共产国际二次召开时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已基本解除，苏俄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了“均衡发展”时期。这时仍要求国际无产阶级以国际资产阶级反对苏俄的斗争为中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就势必以苏俄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滋长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根据。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共产国际一大和二次所通过的纲领性的文件中，以及列宁的有关报告和论述中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不确切的论断和将特定历史条件下暂时措施永久化，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涂上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色彩，使被列宁着力批判过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斯大林时期逐渐复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恶性膨胀。

以上论证和分析表明，列宁时期形成的“国际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实质上包含着苏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二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关

系时，上述原则就被理所当然地解释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利益高度一致原则”。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原则又被“升格”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大家庭论”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至此，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蜕变为“社会霸权主义”，其实质就是苏联领导人借以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列宁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生质的蜕变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必然分裂的命运（实际上也注定了苏联解体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与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其实质就是从根本上解除苏共的控制，预先防止苏联对华举行武装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邓小平说，那场辩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空话”就是指双方说的关于意识形态上分歧的那些话。

有了以上基本认识，我们就不难解决在中苏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也相应地解决了评价中苏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是非标准问题。这个标准不是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谁是谁非，而是是否相互维护和尊重彼此正当的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无论是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凡是苏联党和政府采取维护本民族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的任何举措（以不损害其他民族正当的民族权利和利益为前提）都不应受到指责；相反，只要这些举措超出其正当的民族权利和利益范围，损害了其他民族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就必须予以分析批判，从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评判国家关系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原则。如前文所论述的，这一原则与列宁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本质上并无矛盾。

近年来我们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论著有两种倾向。其一，在评价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理论原则不统一，有的以意识形态（列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标准，有的以国家利益原则或民族利益原则为标准；甚至在同一种论著中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衡量苏联对华政策，反过来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原则来评价中国对苏政

策。其二，有的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著作，不联系两国关系，有些论述两国关系史的著作不联系两党关系，结果统一的中苏关系史被分成两半。这些情况的出现，固然是在中苏关系史上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与民族利益相互交叉在一起的复杂关系的反映，但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看作是民族国家，以上两种倾向或许容易得到校正。

目 录

- 1、前 言..... 薛衔天 (1)
- 2、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
(1945—1949) 薛衔天 (1)
- 3、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
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1950—1953) 沈志华 (26)
- 4、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
演变 (1954—1960) 李丹慧 (61)
- 5、中苏分裂的根源 朱瑞真 (91)
- 6、中苏条约谈判中国民政府东北外交战略..... 汪朝光 (102)
- 7、论苏联出兵东北的历史后果..... 杨玉林 (117)
- 8、盛世才与新疆..... 李嘉谷 (129)
- 9、论西北国际交通线与战时及战后之
中苏关系..... 徐万民 (147)
- 10、时代出版社在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李随安 (177)
- 11、俄苏中国学与两国外交关系 邱桂荣 (189)
- 12、论俄苏在哈尔滨的银行业 黄定天 (204)
- 13、华工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 王 晶 (222)
- 14、远东地区中俄关系之隐忧 张宗海 (235)
- 15、建国后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述略 酆永庆 (245)